

“接地气”历史大命题下的 许衡诗词直白之风与成因

邢怒海¹, 吉发涵²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2.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许衡乃元代理学宗师,其诗词创作以其独特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品多收于《许衡集》。在元代文白转型的历史时期,许衡诗词遵从“接地气”历史大命题的要求,表现出了浓厚的白话色彩,语句多有直白、简明、平实的特点,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个中原因在于大时代汉语白话发展的内在要求、元代诗歌创作风气使然以及诗人理学思想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许衡;《许衡集》;诗歌艺术;白话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8)09-0056-0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以善于打比方、讲俗语,“用大白话、大实话等进行表达而著称,比如‘打老虎’、‘拍苍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这些俗白浅近的词语正是“接地气”的表现。此般话语,直白鲜活、简洁朴实,以平民化的视角把当前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讲得晓畅明白。可以说,“接地气”不仅是当代社会话语趋势,而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承古而来的历史大命题。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接地气”亦是由来已久的历史大命题。我国古代诗歌的源头《诗经》《离骚》,就大量采用了先秦民间口语入诗,体现了浓郁的生活“地气”,其后的汉乐府,王维、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歌,元曲杂剧,明四大奇书等都延续了以白话口语入诗为文的传统,呈现出“接地气”的精神气象。

在以“接地气”为命题的汉语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形态促使白话演进为全民通用语,“白话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交流沟通的应用语体”^[2]。元代政府

在治国理政中,所用语言即当时的口语白话——“汉儿言语”,作为施政的重要手段,“元代的诏书敕令等都是先用蒙古语写成,然后译成汉语白话,形成‘白话讲章’‘白话公牒’,这促使汉语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定位”^[2]。

宋元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市井文化的兴盛,“在客观上也促使汉语文学由庙堂之乐转向俚俗之曲,语体上由文言走向口语化的白话……一些文人也直接使用北京口语编写杂剧和小说,大多‘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初步做到了言文一致”^[2]。元代文学的俚俗之风盛行天下,河南人许衡在这文学“接地气”的变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许衡诗词成就与概貌

许衡(1209—1281),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元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任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等,“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被誉为“元朝一人”“朱子后一人”,是古代河南人的光辉

收稿日期:2018-02-06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2016GGJS256);上海师范大学培优项目(A013217002015)

作者简介:1.邢怒海,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研究;2.吉发涵,男,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词汇史研究。

形象和优秀代表之一。作为理学大师,许衡著述春容大雅,蹙金结绣,诗文被《元诗选》《全元文》《元诗别裁集》等文集所选录,历代赞誉有加,如“先生开国大儒,不借以文章名世。然其古诗亦自成一派,近体时有秀句”^[1],切中肯綮。许衡的文学成就在当代也得到重视,如《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将其列入由金入元的河南诗文作家,《元明清词鉴赏辞典》选录其《沁园春·垦田东城》《满江红·别大名亲旧》两首,反映了当前学界对其文坛地位的认可。

许衡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众多优秀诗文。许诗题材广泛,主要为即事感怀之作。诗言志亦缘情,许衡感情细腻,忧思报国,常感时伤事、人生际遇,因触目感怀而引发不尽感慨,忧逢时事、思乡怀亲等成为许氏诗歌中的主调。许衡游学多年,遍访北方名山大川,吟咏山水成为许氏诗歌的另一主题。许衡的时代是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借景抒情,以自然风光寓托思想情感成为许诗的常用手法。另外,怀古咏史、咏物言志也是许诗所涵盖的题材,或以史为题,借古讽今,或咏觞外物,传情达意,以不同的方式传达诗人内心感触和追求。

诗歌语言风格研究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许衡作为元代重要的文学家,目前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其文学成就、艺术特色以及诗歌内容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方面,而对其语言风格的研究尚未见。深入研究许氏诗词“接地气”的直白风格,有利于扩展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视域,使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观照元代诗歌发展状况以及元初白话的流布行用。

二、许衡诗词的直白之风

许衡善于使用简明直白、平实浅易、“接地气”的语言来解释、表达较为复杂的道理和深厚情感,长于用老百姓的话写老百姓眼里的世界。许氏诗歌语言虽然“浅俗易懂”,但“览书者毋以其言辞俗浅而易,若得圣贤与鲁斋之心,不啻刍豢之悦,口味尤深矣。宜熟思之”(朱厚烷《重刻〈心法〉序》)。总体上看,许衡著述的特点是“精简”而又“切事”,“然惟其书之简也,故为说精;惟其说之精也,故于事切”(顾清《校刻〈鲁斋先生遗书〉序》)。许衡诗歌的直白、简明、浅易等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词语俗白质朴

1. 许诗常以民间俗字入诗,如“晓起北窗凉,清谈戢羽觞”(《赵氏南庄》)。《广韵·江韵》:“窗,《说文》作窗。窗,俗。”《正字通·穴部》:“窗,俗窗字。”白居易《秦中吟·议婚》:“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元孟汉卿《魔合罗》:“红油门儿,绿油窗儿。”(第二折)又

如:“一簪除旧习,千古立深根。”(《子仁改冠》)《龙龕手鏡·花木类·竹部》:“簪,俗。”即“簪”的俗字。再如:“何时太华高峰上,细嚼松阴六月冰。”(《大暑登东城六首》)冰,《字汇·水部》:“冰,俗冰字。”俗字即通俗字体,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字形相较正体字虽多不规范之处,笔画略有减省或变化,但流行通用于民间,属于一种书写方便的浅易字体。许诗多用俗字,方便阅读,无形中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使得诗句间充满了“地气”。

2. 许诗亦多用俗语方言入诗。如《梦中》:“花谢花开,时去时来。福才慰眼,祸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可哀。得失在天,敬听天裁。”按:“慰眼”,亦作“喂眼”,《汉语大词典》释为犹饱眼,谓有眼福。该词首见于宋,为近代白话,如金元好问《遗山乐府》卷中:“东风容易莫吹残,暂留与、何郎慰眼。”又如:“善善不可缓,安安贵能迁。人生喻此意,自当心干干。”(《观物四首其二》)善善,《汉语大词典》释为:方言,意为轻易、随便。如《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七回:“那人家善善的肯分与他便罢;若稍有些作难,他便拿了把刀要与人斫杀拼命。”“善善”之言,不过下里巴人之常语,以此入诗,可谓俚俗。“说话人与听话人在认知语境上越是趋同,交际就越易成功。”^[2]由于此规律,许诗不避白俗,以乡民日常用语来写作,除表达亲人之间的殷切之情外,使得诗歌贴近人心,减少了雅文学形式带来的疏离感,亦表现了许诗的直白浅易的特点。

(二)大量使用重言叠字

古典诗歌常采用重言叠字的形式,用来模拟声音,形容状貌,达到“拟俗显真”的效果,如《诗经·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重言叠字这种构词方式源自日常口语,是口俗之言在文学体裁中的再现和重构,如郭绍虞所言:“案此亦古人修辞惯例……实则古人为诗,根据口语,口语中有叠字,则连用之,益见其轻松流利,此所以复而不厌。”^[3]诗词中使用重言叠字,也是“接地气”的表现。

许衡诗歌在语言上也大量使用叠字,仿效《诗经》此种笔法来加强抒情描写的力度,同时使得全诗的节奏、韵律和谐有序。如《有感二首》:“悠悠故乡情,滴滴眼中泪。”悠悠,语出《诗经·邶风·终风》:“莫往莫来,悠悠我思。”郑玄笺:“言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意为思念貌、忧思貌。后世常用。滴滴,见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作漉酪法:八月中作。取好淳

酪,生布袋盛;悬之,当有水出,滴滴然下。”意为一滴一滴,如唐苏颋《兴州出行》诗:“滴滴泣花露,微微出岫云。”(《汉语大词典》)许诗中,此两句分别使用叠字,生动传达了其中蕴含的细腻情感。

(三)平民化视角和叙事方式的纯熟运用

传统诗文多属于“雅文学”的范畴,这些“文言雅文”以文人化语言创作,口语化程度不高,与普通民众的认知与生活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许多优秀的诗人常常致力于诗歌的平民化、通俗化,努力让庙堂文学融入现实语境中去,例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从内容到形式均平民化的诗句,成为诗句“俗化”的典范。在元代这个白话突飞猛进的时代,许衡的诗歌纯熟运用了平民化的艺术手法,以比较通俗、“接地气”的言语描述生活俗事,将民间生活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消解了诗歌与普通百姓间的疏离感,这是作为上层知识分子的许衡在诗歌创作上的一个亮点。

许衡诗歌在创作中文字简练朴素,借鉴传统绘画的白描技巧,不事雕饰,注重以形传神,尽量以平民化的手法进行描摹、勾勒,如“大山如蹲龙,小山如踞虎”(《别西山》),寥寥几笔,几个词语,如“蹲龙”“踞虎”,就画龙点睛地描绘出两座山峰的形态特点和差异,而且活灵活现,生动有感,仿佛蓄势待动一般。以老百姓的话来说,不过是“大山像条龙,小山像老虎”之类,虽然原汁原味,但缺乏艺术的意蕴。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这里,许衡以简洁、形象的两句话,用平民的视角和叙事特点来组织诗句,但并没有照搬生活原句,而是去其鄙俗之气,用其白俗之质,精心运用语言要素,扣住描写对象的特征,如实地勾勒出景物的情态面貌,达到了以“形”传“神”的艺术效果。这样的诗句,来自生活,但又经过了“润物细无声”的打磨,既有生活的影子和味道,充满“地气”,又显现出艺术的品质光芒,具有灵气。老百姓读了,借助其内在的“地气”,亦会感受到诗人与自身内在的精神联系与沟通。

许衡诗作的特点,即平铺直叙,不求文饰,如“花谢花开,时去时来”“得失在天,敬听天裁”(《梦中》),恰如鲁迅云“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作文秘诀》)。许衡对事理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心性修为通达而又率真,对人生得失秉持自然通脱的心态来看待,在表达上则秉笔直书,直抒胸臆,如《病中杂言六》“人人都畏死来催,我道人生死是归”,所谓直言不讳,亦是如此。

许衡的感情是真摯率性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自然的热爱,也不隐藏内心对山林的向往,所以他率

性写出“我爱林虑山”“我来苏门居”(《别西山》),“我生爱林泉,俗事常鞅掌”(《游黄华》)这样直露平白,甚至是直截了当的句子,借以传达其浓厚热烈的真实感情,可谓一腔热血、一声呐喊喷薄出胸膛。诗句着墨不多,却情真意切,全无造作之态,气息与元好问之《题西岩》“人爱名与利,我爱水与山”(汲古阁本《中州集·乙集》)相仿。他用语朴素流畅,不事繁复华丽的辞藻,抒发的感情却真挚感人,如“大儿愿如古人淳,小儿愿如古人真”(《训子》),语句虽然平实简单,包含的却是做父亲的深厚慈爱与殷切期望,许衡对待子女是醇厚朴实的,“但愿吾儿会读书,不妨贫苦一钱无”(《病中杂言七首》),不期待他们发财致富,只是希望能够读书上进,这和老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能够引发共鸣。这个期望是否能够实现,许衡则鼓励他们,“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病中杂言七首》),睁大眼睛,看好脚下的路,前途就会光明,以形象又直白的话语讲述了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尤其“大如轮”一语,夸张、形象,不失诙谐。这样的语言和生活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使读者备感亲切,易于接受,所谓“接地气”,这也是一种方式。

在《游孙氏别墅》中,许衡更是突显平民化的语言与风格来书写所见所闻。在传统乡村居落里,邻里建屋,是为喜事。许衡的朋友新建了别墅,遵照乡俗,自然要祝贺一番,于是“闻道阿孙别业新,招呼诸子共寻春”,带着子弟共往贺喜。诗中“阿孙”为许衡对孙姓朋友的亲切称呼,类似鲁肃称吕蒙为“阿蒙”的典故,亦为当时民间俗呼,颇类今日许衡故里“老孙家、老李家”之类的称呼,蕴含着浓浓的乡俗之情,使人听之备感亲切。这样平民化的行事方式,平民化的言语称谓,平民化的情感表达,全方位构建了许衡诗歌的平民化风格。更直白表现许衡此种风格的诗句是他的“有财足使人羡慕,有势足使人奔趋……今年金辂满千驮,明年好上登封书”(《和吴行甫雨雹韵》),化用民间俗语,叙事直陈,宛如百姓之口语,其表情达意,亦是明白通畅。诸如此类诗句,不胜枚举,又如“儿望母时儿哭母,母寻儿处母啼儿”(《九日思亲》)、“自笑平生,一事无成”(《沁园春·东馆路中》)等,与王梵志等人的“白俗”之风颇有相近之处。

三、许衡诗歌直白之风的成因

(一)汉语史上文白发展转变的语言因素

“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得从语言之本质那里获得理解。”^⑥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汉语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语言发展体,它始终处

于蓬勃变动之中。周秦之际,文白已经出现歧义的态势,汉魏至唐宋,文言与白话呈现出愈加鲜明的分离趋势,白话在社会中的使用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对话语体系的掌控也在不断提升。宋代白话多使用于社会中下阶层,从元代开始,逐渐浸入上层贵族话语体系,从而开启了白话的全社会化阶段,因此,元代成为汉语史上关键的转折期,白话渐变为社会书面语的主干,彼时文白话语体系步入重要转型关口。从文献的语言成分构成来看,运用白话作为主要话语工具的文献典籍是当时主体,例如碑文、法令、公牍、教材等,都以白话语汇作为书写语言,包括许衡本人的《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著述,就是自觉运用口语诠释经文的经典作品,而且深刻影响到当时和后世的叙写方式,如贯云石《孝经直解》便是仿许衡之作,完全采用当时流行北方的白话加以叙说。再如乔吉《杂情·采茶歌》:“本待做曲吕木头儿随性打,原来是滑出律球子怎生拿。”^[7]句中“滑出律”为口语词,意指光滑、打滑,现代北方口语称“出溜”。可以说,“作品所蕴含的使用白话的立场和态度,真正体现了书面白话著述的自觉,这在古代白话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意义”^[8]。

诗歌的直白之风一脉相承、紧密相连,从《诗经》便可见端倪,如《诗经·邶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其言多浓厚口语色彩,可谓明白如话,通俗淳朴。历代诗歌创作多循此风,如汉乐府,“浑朴真至,独抚古今”(胡应麟《诗薮》),历经魏晋唐宋,诗歌中的白话色彩愈加浓厚,唐诗宋词多熔炼通俗易懂口语入词句,如王梵志、李白、杜甫、柳永、李清照等,用语多浅近平白,显现了一股清新自然之态。许衡对《诗经》的独特魅力感同身受,尝言:“三百篇,古乐章也。与后世乐章大异,尤见古人敦本业、厚人伦,念念在是,未尝流于邪僻也。”(许衡《语录上》)受此影响,许衡以及当时的众多诗人,以现实主义为创作主旨,继承了汉唐以来平白浅易、通俗活泼的诗风,故其叙写手段就必须自觉运用口语白话来完成言说,更重要的是文白话语体系在元代出现了重要转折,汉语白话发展史上已经步入一个自觉意识期,汉语的发展趋向与价值取向出现了新动向,“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既要求雅又从俗的发展趋向,即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9]。这个转变直接影响到许衡诗歌创作中的语言运用,许诗的直白之风正是对汉语大变革的回应,体现了汉语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在语言史和文献学上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二)元初宗唐的文学因素

金末至元代初年,文坛时风以宗唐为盛。“金室南迁,是金代诗学风气的转折点,诗人们弃宋而学唐。”^[9]在这宗唐之风中,杜甫的风格受到当时诗人的大加赞誉和模仿。社会上之所以流行宗杜思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杜甫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直接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历代文人学者都对此予以肯定和认可,也就是说,杜甫诗歌与《诗经》在精神和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把“接地气”视为核心主旨。

许衡诗歌中最明显、最直接体现宗杜思想的是他的《戏学老杜去蜀诗》,首先在标题上,就直截了当说明这是模仿杜甫诗作,而诗歌的体裁、语言、诗意无一不是对杜诗的致敬,“十载他乡寓,千山故国赊。如何虚度日,不肯去还家。往事知难及,余生度可涯。愿言心益地,无用苦伤嗟”。而在《赠窦先生行二首》中,“岂意天书下白屋,便收行李入青云”两句,遣词造句与杜甫诗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颇有相通之处。《游北观》“道宫烟锁树,农舍雨倾颓墙。捕吏翻疑寇,平人却笑狂”所描述的凋敝景象与杜甫的《石壕吏》千般相似,而其中的官吏,残暴如寇,其形象仿佛穿越自杜诗。

除宗杜之外,许衡对唐代其他诗人也满怀敬意,如《喜晴》“绿纡东去水,青起北来山”与李白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送友人》)何其相近,在风格上都是清新而又自然,所描述的风景同样沁人心脾,赏心悦目。其《七月望日思亲》“泰山为砺终磨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是直接借用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成句,表现出鲜明的宗唐倾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歌创作风格都具有平白浅易、清新自然的特点,其遣词用语多选用俚俗口语,手法上也多用平铺、白描,诗作往往直白如话,许衡受其影响,诗歌创作自然不可避免呈现出直白之气。

(三)理学思想的影响

在文学话语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永恒的追问,即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究竟是怎样的。自先秦以来,历代贤达无不试图予以解答,特别是在遭逢乱世、四处飘零之时,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更是急迫,对它的回应更是重要。萦怀同样问题的许衡在经历多年研习之后,最终接受了朱子之说,决意以理学应对追问、直面社会与人生。

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原本是为了抗拒隋唐以来日益高涨的皇权的。宋室南渡之后,北方处于思想蛮荒之态,特别是蒙古统治者残留的氏族奴隶制意

识,对社会、历史的进程无疑是一个严重阻碍,复兴理学,推行汉法,成为时务之急。1242年,许衡慕名拜访理学名宿姚枢,开启了他的理学思想历程,“程、邵之统,先生实身之矣”(明张泰徽《重刻〈许鲁斋先生文集〉序》)。许衡作为元代理学大师,承上启下,力扫朱子学颓势,对于理学思想的中兴起到了独特作用,时有“南有草庐,北有鲁斋”之誉。受理学之影响,许衡对诗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诗文只是礼部韵中字,已能排得成章,盖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独诗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义也,道也,只是一般。”(许衡《语录上》)王素美(2007)认为许衡“将‘道’解读为人生日用的切实内容”,将目光投向了“只是一般”现实人生,这是对宋代理学的继承,是许衡理学观点向诗歌理论迁移的结果^[10]。许衡之言,显然是一种创新,诸如“盐米细事”之“日用常行”都可以为文入诗,如其《沁园春·垦田东城》:“月下檐西,日出篱东,晓枕睡余。唤老妻忙起,晨餐供具,新炊藜糝,旧腌盐蔬。饱后安排,城边垦廛,要占苍烟十亩居。闲谈里,把从前荒秽,一旦驱除。”清晨月落日出,一觉醒来,慌里慌张招呼老婆侍弄早饭,吃什么呢?玉米糝儿糊糊配腌咸菜。辛弃疾也曾在诗中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如“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村居》),与许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许诗所描绘的不过是一顿早餐而已,吃的又是最普通习见的农家食物,吃完之后继续耕田罢了。如此“俗事”,真的是“柴米油盐”之计,也是许衡实践以诗写闲事的主张,其中呈现的,确是一股冲淡平和之气,而采用的俗语“唤老妻”“安排”等更是“地气”的呈现,并最终升华为直白之风。

(四)崇陶观念的影响

秉性真淳的许衡与陶渊明思想观念相近,同样深受儒道思想影响,既积极入世,“猛志逸四海”(陶渊明《杂诗》),希望建功立业,又热爱自然,归隐愿望极其浓烈,从他五次应召与辞归、隐居泰山与苏门山等可以看出,入世与出世思想严重缠绕在一起,所谓胸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为过也。许衡与陶渊明的生活时代也同样相似,陶渊明处于南北割据对立、争战不休、充满痛苦与离乱的时代,而许衡的时代,是金元兴替、烽火侵扰的时代。迫于战乱,许衡与家人逃离新郑故里,路遇蒙古军,父子失散,兄弟被掳,许衡逃亡至山东、河北、河南。面对颠沛流离的现实境况,陶渊明的《桃花

源记》无疑成为那个时代文人心中美好追求,能躲避兵火,与家人厮守,丰衣足食,不问世事,已然成为人人憧憬向往的美景。元初著名诗人刘因“推崇陶渊明的清高傲骨,写《和陶诗》七十多首”^[11]。相同的命运遭际和文化挫折引发了许衡的共鸣,仰慕世外桃源、追求平和安宁成为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他先后创作了《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五首,内中有“武陵曾有避秦人,人世高跨拟慕真”“桃溪将拟武陵溪”“桃溪风景写横披,浑似秦人避乱时”,“桃溪”“武陵”,成为重要的意象符号,徘徊反复,诉说跨越千年的心境。除此之外,许衡受陶渊明诗歌的影响,在写作中常常效仿、借鉴陶诗“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风格与词语,隐居与饮酒成为他诗中常存的题材,借以表达其追求隐逸淡泊、安贫乐道的夙愿,如:“守志王元伯,甘贫范史云。铜台书废读,东郡酒方醺。何日寻先约,青灯共夜分。”(《忆贾君玉》)抛开世俗的读书,与品行高洁的朋友一起饮酒“方醺”,甚至还要醉至“夜分”,这是何等洒脱放达!这样的做派,这样的语句,不难在陶渊明那里觅得踪迹,如:“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许衡家族世代务农,他与陶渊明一样对田园生活具备同样的旨趣与热爱,因此许衡诗歌与陶诗一样,反复吟诵、赞赏的意象是“桑田”“茅舍”一类,如许衡《沁园春·东馆路中》“五亩桑田,一区茅舍”,将企羡隐逸之情投射于追求精神自由的田园之风内。又如其《用吴行甫韵》所吟“五亩桑麻舍前后,两行花竹路西东”,用自然、朴实的语言构造了一派高度纯化、美化又充满自然意趣的恬静田园风光,其意境浑然天成、瑰丽明媚,展现了淡泊、宁静,甘于清贫、乐道守节的人格美,可谓佳句。细观这些诗句中的词语,不过是日常所用之语,浅易质朴,直露平白,天然无所雕饰,但是鲜明显露出直白之气。

就陶渊明诗歌的内容而言,大多取材于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常来源于朴质无华的普通元素,质性自然,故朱熹评价他的诗说:“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清顾炎武《日知录》)其创作特点更是弃文饰,去辞藻,直写其事,抱朴含真,以素描构建出平淡却隽永的意境,给人以不尽回味。陶诗惯于以日常口语入诗,其诗歌语言同样具有朴素自然的本真特点,展现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的效仿、词语的选择,最终对许衡诗歌的直白之风气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可谓时代风气使然。这些诗句,也是许衡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密切接触底层百姓而引发的真情实感,是建立在他对现实深刻了解、对

百姓生活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得来的,所以其情亦真,其言亦白,类似于“鸡豚并社酒,处处是欢声”(《喜秋晴》)这样白俗浅易、“地气”十足的诗句在许诗中比比皆是,构成了许衡诗歌直白之风的深厚语言基础。

四、结语

以“俗言”写“俗事”,表达“俗情俗意”却不“庸俗、鄙俗”,这正是许诗以艺术化的手法来表达“接地气”的成功所在。许衡诗词以平民化的视角叙事抒情,以白话口语表情达意,体现了文学创作方式的多样化和“由俗入雅”的趋势,是对金、元时代社会多元化的反映,是对“接地气”历史大命题的回应,也是整个汉语白话发展大趋势的时代体现。“白话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交流沟通的应用语体,客观上推动了文白此消彼长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化,初步形成了文白转型的雏形,对汉语书面语由文言向白话的演变有着深远影响。”^[7]元代和明初的布告多用白话撰写,或许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那么从许衡以白话入诗和当代政府工作报告多次使用口语俗词来看,更多地表明白话是“接地气”的必然所需。习近平在近两年新年贺词这样庄重的文体中也频频使用“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白话俗语、熟语,充分说明“接地气”的话语是适应社会和大众需求的,也是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文白转型”和“由俗入雅”,显然已成为汉语

发展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 [1]陈锡喜.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1.
- [2]徐时仪.汉语白话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95、195、196.
- [3]顾嗣立.元诗选: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434.
- [4]徐时仪.近代汉语词汇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276、268.
- [5]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0—201.
- [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19.
- [7]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0、158.
- [8]徐大军.元代直说作品与书面白话著述的自觉[J].中华文史论丛,2012,53(4):307—334.
- [9]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0.
- [10]王素美.许衡的理学思想与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5.
- [11]程千帆.元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239.

编辑 王秀芳

The Direct Features and Causes of Xu Heng's Poetry Under the Great Historical Proposition of "Being Down to Earth"

Xing Nuhai, Ji Fahan

Abstract: Xu Heng is a famous literati in the Yuan Dynasty. His poetry creation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with its unique styl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Yuan Dynasty, Xu Heng poetry complied with the “down to earth” the historical proposition, demonstrated a strong vernacular color, more straightforward and concise statement characteristics, plain, with a strong flavor of the times. The reason lies in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ernacular in the great era, the poetic atmosphere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et's thought of scienc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Xu Heng; Xu Heng Ji; Poetry Art; Vernacular